

中 国 当 代
教 育 学 家 文 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 组编

东西方教育的覃思

| 任钟印◎著 |

| 杨汉麟◎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东西方教育的覃思

任钟印 著

杨汉麟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是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组织编选的20卷本中国当代教育学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的继续。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文库》主要采取论文精选的形式，荟萃了我国当代教育学家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新时期我国教育学家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是我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新总结、新展示。

◎《文库》对于系统、科学地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智慧、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库》计划20卷，按教育学家分卷，每人一卷。





任钟印 1926年生，湖南岳阳人。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教育著作翻译家。1949年湖南大学法律系肄业，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1951年起先后在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研究生导师。2012年逝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教育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独著、主编、合著的学术著作、高校教材与工具书有《东西方教育的覃思》《外国教育史教程》《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世界教育名著通览》《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外国教育家评传》《教育大辞典》《教育名著评介》《杨贤江全集》等。独译、合译的著作有《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大教学论·教学法解析》《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西方教育经典文献》《外国教育史料》《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人文主义教育经典文选》等。正式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含译著）总字数达1 000多万字。在《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书评40余篇。撰写诗词数十首。学术成果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等奖励。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理 事 长：郭 戈

副理事长(以下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班 华 蔡 春 冯增俊 郭元祥 扈中平
靳玉乐 李夏彬 刘立德 陆有铨 王本陆
王铁军 吴永军 张廷凯

秘 书 长：刘立德(兼)

学术秘书：韩华球 刘 捷

人教版教育学家文集系列

包括《中国当代教育论丛》(20卷,已出齐)

和《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正在陆续出版)

超越与创新

教育论集

现代教育论集

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

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

教育:传统与变革

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

优教与忧思

教育学的探究

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

教育的困惑与诠释

教育:求真留痕

教学的理论与艺术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教育事业·教育科学·教育艺术

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和谐变奏

现代教学论生成发展之思

基础教育政策与课程教学改革

在世界范围内寻觅现代教育智慧

教育经济学建构与教育改革创新

教育的哲思与审视

我的教育觉悟

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

东西方教育的覃思

鲁洁

王策三

成有信

萧宗六

孙喜亭

顾明远

黄济

潘懋元

王逢贤

瞿葆奎

胡德海

李放

金一鸣

董远骞

吴式颖

王炳照

吕型伟

燕国材

裴娣娜

文喆

单中惠

靳希斌

陆有铨

谢维和

田正平

陈侠

任钟印

(按出版时间排序)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进行，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理论界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精辟见解大都集中反映在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和大量学术论文之中。

系统、科学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精华、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组织编选了20卷本中国当代教育学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简称《论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论丛》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编选新时期教育学家自选集，定名为《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简称《文库》）。《文库》是《论丛》的继续，与《论丛》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论丛》已收录的，《文库》不再收录。

这套《文库》各卷的作者大多数是中国当代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在长期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思想开放，工于学理分析，努力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重大教育问题，或系统阐述，或直书议论，或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撰写了一批对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及教育改革与发展有

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新时期教育学家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有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术观点，我们相信，实践会做出检验，时间会做出评判，读者会做出思辨。

这套《文库》主要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每人一卷；收入的选文精选自著者发表过的有关论文，分别标明出处，必要时加题解说明；各卷的选文主题相对集中；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每卷篇幅有所限制，对有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是我们系统总结新中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重要举措。教育学术界学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水平，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工作可能存在不妥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为感。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2014年10月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责任编辑 / 刘捷

封面设计 / 李宏庆

学者本色，大师风范*

——任钟印先生生平及教育学术贡献

(代前言)

杨汉麟

一、从草根族登上学术殿堂的传奇

任钟印(1926—2012)是我国教育理论界所熟知的一位勤奋笃实、善于独立思考、治学严谨而又平易近人的大师级学者。其祖籍湖南岳阳，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适逢战乱，从事过多种职业，甚至“蹶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①，故造就强健体魄及坚韧意志；又曾获资助入教会学校学习，未曾皈依宗教，但奠定扎实外文基础。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与自强不息，他陆续完成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并精通或粗通英、俄、德、日、拉丁文5门外国语。他1949年湖南大学法律系肄业，1951年中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任钟印先生（以下简称任先生）的一生堪称是从身处社会底层的草根族登上学术殿堂的一个传奇。

1951年后，任先生一直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曾先后任公立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还担任过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教育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务。

* 本文原载《中国教育科学》2015年第1辑，收入本书时略做了修改。作者杨汉麟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古代散文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158页。

任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著述等身。他独著、主编、合著的书籍众多，不乏鸿篇巨制，包括《东西方教育的覃思》《外国教育史教程》《外国教育家评传》《外国教育通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杨贤江全集》《教育大辞典》等。这些书出版后，在国内享有崇高声誉。有些书获得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等奖励。

任先生依靠他的语言天赋及深厚文化底蕴，在译著上有独特建树。他能将艰深的外国古代教育文献翻译成明白流畅的现代汉语。他独译与合译的著作有《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大教学论·教学法解析》《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外国教育史料》《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人文主义教育经典文选》等。他所翻译的作品都以文笔典雅、流畅通达著称，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此外，他还在全国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具有独特见解的中、外教育史论文、书评及大气磅礴、意境悠远的古典诗词。

为提携后进及弘扬学术，任先生还应学生、友人请求为一些著作写“序”。他撰写的序与时下常常见到的一些序有所不同，绝非应景之作，除奖掖后进外，还往往借题发挥、铺陈，抒发己见，有着深刻的内容和独特的见解。故这些序也成为著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传，20世纪90年代，一位江西的学子因读到任先生为喻本伐、熊贤君合著的《中国教育发展史》所写的序，为任先生的深邃思想、精到见解所折服，兴奋不已，专程来到武汉，要就读于任先生门下，攻读他的博士，一时传为佳话。

据我粗略统计，任先生的著述及译著已超过1000万字，且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文革”结束后）完成的。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任先生进入耄耋之年后，或许是感到青年时代蹉跎太久，或许是感到老之将至，时不我待，其学术研究及著述、翻译的热情不减反升，胜比壮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在他逝世前的五六年中，几乎每一两年就有一部新著问世。例如，上面提到的《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人文主义教育经典文选》等70多万字的译著就是他在2008—2012年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而翻译的。他还有一本70多万字的译著《西方教育经典文献》（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也是在80岁以后完成的。

任先生在学术求索的生涯中，有着自己一贯的独特风格和信念：博学精

思、求真尚实、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任先生本着这种信念，在教育领域默默耕耘、勤奋探索了60多年，在教育理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做出了弥足称道的贡献。

二、厚积“爆”发，知天命之年学术成就方始凸显

上面已提及，任先生诉诸文字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取得的。生前他曾不止一次对弟子们沉痛地说，他青年时代由于受到种种政治运动干扰，有心而无力潜下心来认真从事学术研究，遑论发表有独立思想的论著。只有到“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焕发出了青春，并稍有别于前人所谓的厚积薄发，成功地厚积“爆”发，尽管此时他已进入知天命之年。

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概述任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

（一）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是任先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任先生就下了极大力气去钻研马列原著，颇有心得。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许多理论的诠释、解读，极富现实意义。

1. 阐释了马克思的早期教育思想及其与后来有关思想的关联性

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巴黎被发现，故该手稿又称《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但多国学者对《巴黎手稿》的研究，大多侧重在哲学层面，特别侧重于热点问题“异化”。他们大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以后的著作所提出的观点与《巴黎手稿》相比是后退了。他们提出要回到《巴黎手稿》，即所谓回到青年马克思，以淡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少数学者从经济学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巴黎手稿》。但是，从教育理论的角度研究《巴黎手稿》的著作极为罕见。

任先生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率先从教育理论研究的角度在《巴黎手稿》中探索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最早萌芽。他的论文《〈巴黎手稿〉与新教育观的萌芽》1995—1996年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连载后，立即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后来又全文收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理念文选》。在该文中，任先生以马克思对“人”的论述为主轴，深入阐释了《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

劳动、个人与社会、主动和受动、主体和客体、人性中的智和愚、善和恶、理论和实践、人的片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等一系列教育理论中的根本原理，探讨了马克思早期教育思想的过渡性及其对后来发展的意义，批驳了企图回到青年马克思的错误观点。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填补了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理念文选》的编者所说：“任钟印教授的《〈巴黎手稿〉与新教育观的萌芽》一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时从教育研究的视角探索《巴黎手稿》的代表作。”^①

2. 批驳了思想战线上的一些错误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处于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诠释、理解出现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方面人们吃尽了苦头，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威望亦因此而遭到损害。在路线和政策上拨乱反正以后，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便成了十分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先生牢记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职责，并利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在有关问题上发表拨乱反正的意见。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实践上所犯的许多急躁冒进的错误，都是源于在理论认识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題。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理论遭到扭曲。他提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上，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作用，试图通过不停地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实际上远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片面夸大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超越经济基础发展的水平，提出不适当的口号。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形成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盲动蛮干。例如，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这些理论、方针、政策上的失误，不能不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战线上一度邪说横行，真伪难辨，使广大教育工作者陷入茫然、困惑，甚至麻木地随波逐流。”^②

① 沈振煜、王坤庆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理念文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任钟印：《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教育思想》，载宋恩荣、吕达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中，在对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的认识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使教育战线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任先生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属性》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力图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针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任先生指出：“知识提高人的自觉性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使人离动物更远。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尊重文明、尊重社会进步。”^①

为了澄清把脑力劳动者列入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偏见，任先生在认真消化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生产的物质产品不只是作为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工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也是生产工人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生产者共同创造的成果。以脑力劳动参加生产过程的人不只是单纯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消费者、享用者，而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共同创造者。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生产者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者同是雇佣劳动者，同是生产工人，同样受资本家的剥削。”^②

针对根据人的世界观划分阶级成分的偏见，任先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熏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决定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决定于他的世界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缺陷不能改变脑力劳动者是生产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而且在生产中创造更多价值、做出更多贡献这一客观事实。”^③任先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教师的看法。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师是生产工人。马克思曾把法国农村中的教师称为“农民阶级的思想家、辩护人、顾问”和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任先生有针对性地指出：“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村学校教师称为‘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社会主义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离马克思、恩格斯太远了。”^④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结合的问题，是文教战线上被搅得最混乱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有的人不顾客观条件，人为地硬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他们认为，把大学教授赶下乡去挑大粪，在田

① ② ③ ④ 任钟印：《马克思、恩格斯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属性》，《郑州铁路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间赶麻雀，同时让文盲、半文盲占领上层建筑，管理学校，或“上、管、改”，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这种愚昧的蛮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后果。任先生深入钻研了马、恩、列的著作，分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历史原因和必然性、必要性，二者之间分工的历史作用，消除体脑分离的历史条件，等等。他指出，在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企图在全民中实现体脑结合，就是如同列宁所说的“叫四岁小孩学高等数学”，是一种“‘左倾’的幼稚病”。

3. 厘清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些不确切或错误的观念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教育学教科书和论文中，对此问题的阐释不够确切，甚至荒腔走板。任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针对时弊，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任先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就克服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近年来国内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产生许多分歧，究其原因，往往是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片面发展的论述。其中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在理论上，仅仅承认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制约性，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人的发展更强有力的制约性，加之奉行教条主义，担心唯恐损害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形象，以致不敢承认没有阶级、剥削的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是片面发展的。

任先生将人的片面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只有将人的片面发展看作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人片面发展的各个方面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实质。如果仅仅从生产关系去解释和探讨人的片面发展，必然走入死胡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克服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任先生还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他指出全面发展的人是体、智得到充分发展和运用的人，是全面发展了自己才能的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不再有地域性、民族性、阶级性局限；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③不再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④通晓生产的整个体系，可根据需要及爱好流动。任先生指出，过去有人将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归结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这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也有人从全面发展中

排除体脑结合，抽象地谈论人的能力、才华的多方面发展，同样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①。

任先生还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做了阐述，强调消灭私有制以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任先生的该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对于理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厘清理论界的一些错误或不实观念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后，在我国出版的教育学或教育史书籍（特别是教科书）中，再也见不到他批驳的错误观念了。这种进步虽然不能完全归之于任先生一人之功，但毋庸置疑，他是为拨乱反正做出重大贡献之人。

此外，任先生对列宁所说的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观点、对毛泽东在 1934 年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和新民主主义文教方针、对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等问题，都有独特的理解和诠释，引人深思。

（二）对史前教育史的研究

任先生对史前教育史的研究颇多创见，更新了人们对史前教育史的一些认识，澄清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悖谬。

1. 提出了教育起源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新论

苏联教育史学家米定斯基关于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论点曾在我国长期流传。米定斯基说：“只有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个著名的原则出发，才能了解教育的起源，教育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②任先生著文，指出了米定斯基的悖论^③。他指出，米定斯基的论断和恩格斯的原则毫不相干，因为恩格斯所说的创造了“人”的“劳动”，是指正在形成中的人利用天然工具进行的简单劳动，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而米定斯基所说的劳动，是指已经形成的人使用制造的工具所从事的人的劳动。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怎能从恩格斯的原则推论出米定斯基的结论呢？任先生提出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童年”，起源于“正在形成中的人”，即起源于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的生物”的观点。他指出：“正在形成中的人虽然还不能制造工具，但

① 任钟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1 期。

② [苏联] 米定斯基著，叶文雄译：《世界教育史》，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第 3 页。

③ 任钟印：《略论教育的起源——兼评米定斯基的“教育起源于劳动”说》，《江汉大学学报》1991 年教育史研究专辑。